

[回族伊斯兰教研究]

中阿民间交往模式的形成、特征及其影响

马丽蓉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上海 200083)

摘要:纵观中阿文明上千年的和平交往历史后发现,中阿之间的民间交往主要通过宗教之旅、学术之旅和商贸之旅等方式时断时续、绵延不断地进行,并形成独特的“三轨并存”交往模式,在中阿民间交往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为新中国对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人文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中阿文明;交往;民间交往;交往模式;人文外交

中图分类号: G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586(2013)01-0040-06

纵观中阿文明上千年交往的历史后发现,中阿之间的民间交往主要通过宗教之旅、学术之旅和商贸之旅等方式时断时续、绵延不断地进行,并形成独特的交往模式,在中阿民间交往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且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三种交往方式的绵延传承

教旅,主要是指来自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的伊斯兰传教士来华传播伊斯兰教、中国穆斯林远赴麦加朝觐的双向之旅。学界多以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遣使唐朝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开始。唐代穆斯林来华,主要在长安、扬州、广州、泉州、海南和川滇等地,多为商人,也有传教士、士兵、工匠,唐廷善待穆斯林,尊重其宗教信仰,不少“住唐”的阿拉伯穆斯林定居不返,以宛葛斯、普哈丁为首的一批圣门弟子、圣裔来华传教,广州怀圣寺、扬州仙鹤寺、泉州清净寺、北京牛街清真寺等名寺的出现,表明“已有大批阿拉伯、波斯、中亚等地穆斯林把伊斯兰教移植到中国。他们之中不少人世居中国,他们和中国的关系由是建立起来,伊斯兰教和中国的关系也就随之日渐密切”^{[1] [P133]}。事实上,在伊斯兰教经陆海两路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因伊斯兰教不主动向外传教,而主要靠先知穆罕默德的弟子或后裔等特殊信奉者自身的繁衍生息发展。在这些传教士漫长的“求知、传教”的历史过程中,既不攻击其他宗教,也不诋毁儒家,赢得底层民众好感和认同。此外,据考证,中国穆斯林朝觐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是郑和的祖父和父亲,这父子俩出国朝觐时间,应在元朝中后期(14世纪),取道海上,远涉重洋。清朝马德新于1814年赴麦加朝觐后撰写的《朝觐途记》“记述了阿拉伯和西亚的一些文物古迹、史地沿革、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是研究清代中阿关系不可多得的文献”^{[1] [P150]}。王宽于1906年赴麦加朝觐后,创办了回文示范学堂及京师清真两等小学堂,并因拥护辛亥革命而受到孙中山的接见。中阿民间交往中的这条双向的宗教之旅表明,“历代阿拉伯—伊斯兰谢赫来华传教和

收稿日期: 2012-12-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GJ033);教育部哲社研究专项委托项目(12JF010);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0JJDGJW021);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08JZD0039)

作者简介: 马丽蓉(1966—),女(回族),新疆乌鲁木齐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伊斯兰教研究。

中国穆斯林去阿拉伯朝觐、访问,造就了不少学识渊博的回族学者,推动了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和阿拉伯,乃至西亚的文化交流,同时也增进了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友谊”^{[1] [P152]}。

学旅,主要是指中阿一些学者、旅人、政治家等为加深人与人之间、民众与民众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彼此沟通和友好情谊而编撰的见闻游记、地区考略等,涌现出一批重要论著,如唐代的《经行记》《中国印度见闻录》,宋代的《岭外代答》《诸蕃志》《地理书》,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伊本·白图泰的《伊本·白图泰游记》,明代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藩国志》,清代林则徐编辑的《四洲志》、徐继畲编撰的《瀛洲考略》、龚荣的《阿拉伯考略》等等。其中,“杜环是我国古代第一个到阿拉伯地区游历的人,他的《经行记》真实可信,很有价值,是研究西亚北非古代史和中国与西亚非洲关系史的珍贵文献。他最早把阿拉伯和伊斯兰教确切地介绍给中国人民,堪称中阿关系史上的瑰宝”^{[1] [P52]}。“《中国印度见闻录》是迄今我们知道的第一部记录中国情况,称道中阿友谊的阿拉伯文著作,受到阿拉伯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广泛喜爱”^{[1] [P54]}。伊本·白图泰的《伊本·白图泰游记》记述了中国泉州、杭州、广州等城市的市场贸易、清真寺、穆斯林生活、民族关系等,以及对当时中国与印度、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等地的贸易与当时航船的记载,对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元代中外关系史都有重要参考价值。郑和下西洋之伟大壮举被其团队成员所撰写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藩国志》等作了最直接的历史记录,还记载了沿途所历各国的山川景色、物产资源、风土人情、宗教信仰以及社会制度、人民生产和生活状况等,成为研究当时亚洲诸国民族、民俗、地理、历史的重要文献^{[1] [P55-57]}。

商旅,是指往来于陆、海两条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大宛、康居、印度、安息、阿拉伯、西突厥等国家和地区普通商人开展跨境贸易之旅,在唐、宋、元时,在长安、广州、泉州等地侨居的外商多达万人,乃至10万人以上,大体历经几个阶段:普通慕华者随商队或商船来中国→蕃坊的形成→蕃客家族巨富的出现→移民的流动等。丝绸之路上的商队从中国主要运出铁器、金器、银器、镜子和其他豪华制品等,运入中国的有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菠菜、黄瓜、石榴、稀有动物和鸟类、植物、皮货、药材、香料、珠宝首饰等等,中阿文明物质层面的交往已经惠及双方民众的日常生活,如在怛逻斯战役中被俘的杜环,就在异域他乡看到了“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吕礼等。”^[2]这些在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传播造纸、丝绸等传统技术的中国工匠,也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者。

蕃坊(亦称蕃巷或蕃市),是中国唐宋时期阿拉伯、波斯穆斯林侨民在华聚居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早期组织形式,因来华的大食、波斯商贾被称作“蕃商”“蕃客”而得名,且多位于沿海港埠(如泉州、广州等地),坊内有清真寺、集贸市场及公共墓地等。其领袖“蕃长”或“都蕃长”,多由侨商推荐德高望重、有才干、有宗教学识的穆斯林长老担任,经中国当朝皇帝诏命认可。蕃长既是处理俗务的社会领袖,又是处理教务的宗教领袖。作为伊斯兰教华化的社会组织形式之一,蕃坊内宗教与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密切结合,初现政教合一特色,尤其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国政府管辖并为之服务,更被视作中国伊斯兰教史上最早的穆斯林组织形式。经研究发现,唐廷对包括阿拉伯穆斯林在内的外商实施优待和保护政策,只要外商有地方官员和市舶主管人员开具的身份、钱物证明等,就可在政府许可的城市、港口进行贸易;宋承唐制,继续对阿拉伯等外商实行保护和扶持政策,大食商人多巨富,在外商中位居首要,并涌现出蒲希密、蒲亚里、蒲罗辛以及蒲寿庚等人即为明证,尤其是宋末明初的阿拉伯商人蒲寿庚及其家族则成为外商中势力最大、财力最雄厚、社会影响力最广泛者,并为发展中阿航海贸易作出了重要贡献,使泉州成为中阿民间商旅往来的重要港口。明清之际,中阿官方的经济交往日趋衰落,但民间商旅一直未断。

进入近现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均遭到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致使两大文明的官方交往严重受阻,但双方的文化交流并未中断^[3],尤其是双方在宗教、学术、经贸等领域人员往来,为当代重启中阿文明交往积累了宝贵的财富:(1)宗教领域的人员往来主要表现在朝觐上:达浦生阿洪于1937年12月只身出国宣传爱国抗日,撰写《告全世界穆斯林书》来揭发日本60年来侵华史实和近年日寇侵华罪行,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兄弟给日寇以舆论上的谴责及经济上的制裁,引起中近东各国的极大关注;1939年1月,留学埃及的中国穆斯林学生组织了“中国回教朝觐团”赴麦加期间,在履行宗教功课的同时宣传抗日爱国思想,赢得途经伊斯兰国家的同情和支持,日伪政权此后再也不敢组织朝觐了,就连国民党政府主席都不得不于1940年签署文告肯定“我忠勇之回教同胞”,“搏国人之敬爱,国际方面之同情”^{[4] [P163-164]}。(2)中阿学术领域的人员往

来主要有:1919年8月14日陈毅等30人、12月聂荣臻及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往返都经过苏伊士运河;1922年,伊斯兰教学者王静斋入埃及艾资哈尔大学学习,1924年回国,后在天津创办中阿大学;1931年,阿拉伯学者马坚、纳忠等人前往埃及艾资哈尔大学学习,1930年代共有六批36人前往该校学习;1932年和1936年,北京阿洪马松亭两度赴麦加朝觐,事后前往埃及等国考察伊斯兰教育和文化,曾谒见埃及国王福德一世、国王法鲁克以及艾资哈尔大学校长,力促派遣来华阿拉伯语教师以及给予20名中国学生奖学金等事宜,回国后创办了福德图书馆等。可见,近代中阿文明交往呈现出“由盛到衰、由官至民”的这一基本趋势。但中阿民间的教旅、学旅和商旅一直在持续,中阿文明交往并未中断,且形成了中阿民间交流的独特方式与途径。

二、独特交流模式的显著成效

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人民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阿民间交流进入新的历史时期^[3],尤其是在倡导并贯彻“文化、贸易为外交的两翼”思想的具体实践中,不仅赋予中阿民间交流以新的时代内涵,还使得中阿民间“三轨并存”的交流模式最终得以定型。1955年4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达浦生阿洪以伊斯兰事务顾问的身份随同周恩来总理出席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的亚非国家“万隆会议”,为中国穆斯林完成朝觐天命创造了契机。达浦生阿洪和其他成员向伊斯兰教国家的代表介绍了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我国各族穆斯林在新中国得到的进步和发展。在周恩来总理、埃及纳赛尔总统和沙特费萨尔亲王的共同努力下,1955年8月,新中国第一个朝觐团一行20人,由达浦生阿洪任团长前往麦加完成了朝觐天命,受到世界各国、特别是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普遍关注,朝觐团又应巴库里的邀请从沙特转道埃及进行访问,归国途中还顺访了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埃及于1955年5月15日派出第一个由宗教基金部长巴库里为首的宗教代表团正式访华,双方讨论了政治、贸易、文化和宗教问题,商讨了贸易代表团互访、签订贸易协定、互设官方贸易代表处等,并签署了“文化会谈纪要”,包括双方互派教师、聘请埃方宗教学者来华讲学、互派留学生和文艺团体互访等内容。巴库里的此次成功访华,开启了新中国与非洲、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与发展中国家友好交往的大门。满载着中国人民兄弟般情谊而回国的巴库里,在埃及报刊上发表了《在中国人民的见闻》,盛赞新中国公民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特别是中国穆斯林可以在经学院和清真寺研习《古兰经》等伊斯兰文化典籍……巴库里的这篇访华见闻一经发表,就被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媒体争相转载,有助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民众了解新中国的真实情况,也有助于清除西方媒体蓄意炒作“中国没有信仰自由”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考虑到让世界人民了解新中国穆斯林的真实情况,促进中外穆斯林的友好交往,早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之前,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筹委会根据会议决议,组织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穆斯林朝觐团,但未能成行。1956年,由包尔汉任团长的新中国第二个朝觐团一行37人抵达麦加后,曾受到沙特国王3次接见,全体中国哈吉吻了天房玄石,包尔汉还应邀参加了“洗天房”仪式,并接受了沙特国王赠送的天房幔帐和阿拉伯民族服装……此后,中阿双方加快了文明交往的步伐。1955年8月,埃及工商部长努赛尔率贸易代表团来华访问时双方签订了“中埃两国政府贸易协定及议定书”,促成两国于1956年初正式互设商务代表处;1955年9月,中国主管部门选派1名教师和7名学生开始了赴埃前的集训工作,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们,指示师生们同商务代表处人员一起赴埃,并对出国后的学习和工作做了重要指示。1956年1月初新中国首批赴埃师生和商务官员到达埃及,中国驻埃商代处正式成立,8名中国师生也开始了在埃及的工作和学习;1955年11月30日,中国和叙利亚签订贸易协定;1955年12月31日,中国和黎巴嫩签订贸易协定,规定双方互设商务代表处;1956年1月,中国驻埃及商务代表处成立,同年2月,埃及驻华商务代表处成立;1956年2月,埃及驻华商代处在北京成立,同时派4名埃及人来华学习和交流;1956年2—4月,中国政协副主席兼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包尔汉率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80余人访问埃及,双方签订了“中国埃及文化合作协定”,沿途顺访了苏丹、埃塞俄比亚、叙利亚、黎巴嫩等国;1956年3月,中国外贸部长叶季壮率团参加开罗博览会,并进一步落实购买埃及棉花等事宜;1956年4月15日,中国与埃及签订两国文化合作协定……1956年5月30日,中埃正式建交,因其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明、特殊而重要的地缘因素,埃及成为新中国外交开辟新天地的一个重要国家之一。

中埃建交不仅带来了中阿第一次建交高潮,还使得中阿民间交流模式轮廓凸显,并极大地带动了中阿民

间在教育、宗教及经贸等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教育领域的往来,主要包括互派教师、留学、访问、教研合作、联合办会以及设立孔子学院或中国文化中心等,并向其他伊斯兰国家辐射(参见表1)

表1 阿拉伯—伊斯兰国家近五年设立孔子学院一览表(2005—2010年)

设立时间	设立双方	共建学校	其他
2005年5月	中国—乌兹别克斯坦	兰州大学—塔什干国立东方学院	
2006年2月	中国—孟加拉国	云南大学—孟加拉国南北大学	
2006年9月	中国—马来西亚	上海交通大学—马来西亚全球教育管理集团	由2005年底合作成立的“全球汉语中心”纳入
2007年2月	中国—黎巴嫩	沈阳师范大学—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	阿拉伯、中东地区的第一所孔子学院
2007年4月	中国—巴基斯坦	北京语言大学—伊斯兰堡国立现代语言大学	
2007年9月	中国—印度尼西亚	海南师范大学—印度尼西亚雅加汉语教学中心	
2007年10月	中国—吉尔吉斯斯坦	中国新疆大学—比什凯克人文大学	
2007年11月	中国—埃及	北京大学—开罗大学	北非地区首所孔子学院
2007年12月	中国—哈萨克斯坦	西安外国语大学—哈萨克斯坦欧亚大学	
2008年1月	中国—阿富汗	孔子学院总部与喀布尔大学	
2008年4月	中国—埃及	华北电力大学—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	
2008年9月	中国—巴基斯坦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巴基斯坦穆扎法尔格尔市短波收听俱乐部	巴基斯坦穆扎法尔格尔短波收听俱乐部广播孔子课堂
2008年10月	中国—苏丹	西北师范大学—苏丹喀土穆大学	
2008年10月	中国—塔吉克斯坦	新疆师范大学—塔吉克斯坦国立大学	
2008年11月	中国—土耳其	厦门大学—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	中东地区非阿拉伯国家第一所孔子学院
2009年1月	中国—伊朗	云南大学—伊朗德黑兰大学	
2009年2月	中国—哈萨克斯坦	兰州大学—哈萨克斯坦国立民族大学	
2009年4月	中国—约旦	沈阳师范大学—约旦安曼TAG	
2009年5月	中国—吉尔吉斯斯坦	新疆师范大学—吉尔吉斯民族大学	
2009年9月	中国—突尼斯	孔子学院总部、广播孔子学院、突中友好CRI听众俱乐部—突尼斯斯法克斯UNI-VERSAL HOUSE继续教育中心	广播孔子学院在阿拉伯世界建立的第一个孔子课堂
2009年11月	中国—阿联酋	北京外国语大学—扎伊德大学	
2009年12月	中国—摩洛哥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穆罕默德五世大学	
2010年4月	中国—土耳其	上海大学—土耳其海峡大学	
2010年4月	中国—印度尼西亚	华中师范大学—泗水国立大学	
2010年6月	中国—印度尼西亚	福建师范大学—阿拉扎大学	
2010年6月	中国—印度尼西亚	东北师范大学—丹戎布拉大学	

2010年6月	中国—阿联酋	宁夏大学—迪拜大学	阿拉伯半岛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第一所孔子学院
2010年8月	中国—印度尼西亚	广西大学—玛琅国立大学	
2010年10月	中国—印度尼西亚	河北师范大学—马拉拿拉基督教大学	
2010年10月	中国—印度尼西亚	南昌大学—哈山努丁大学	

宗教领域往来仍以朝觐为主,从1955—1964年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共组织朝觐10次,人数132人次。但在“文革”期间,朝觐活动陷入停顿,直到1979年10月才得以恢复,中国朝觐团时隔14年后再访沙特,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并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朝觐者展示了“中国拨乱反正后宗教信仰自由重新得到尊重和保证的可喜进步”^{[4][P164]}。从1979年至1990年,中国与沙特等6国建交,实现了中阿建交的第三次高潮,尤其是“中国穆斯林通过朝觐活动对增进中沙相互了解、加强友谊、加速实现关系正常化发挥了重要作用”^{[4][P164-166]},使得1990年的中沙建交成为水到渠成之举。从1985年起实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朝觐政策,“近些年来,在外交、公安、海关、外汇管理、中国银行、民航等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朝觐活动逐步走上有序、规范、正常的道路”^[4],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朝觐外交,为对阿宗教外交打下坚实基础(参见表2)。

表2 中国赴沙特朝觐人数表^①(2006—2011年)

年份	朝觐人数(人)
2006年	7 000
2007年	10 318
2008年	11 800
2009年	12 730
2010年	13 500
2011年	13 700

在经贸领域,中阿民间交流与合作明显弱于官方层面,彼此的合作潜力有待进一步发掘。据一些伊斯兰经济学家预测,2020年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将增长10.4%。原因在于伊斯兰世界拥有占世界73%的石油储备,矿产资源丰富。而伊斯兰银行在国家间金融融资方面,又发挥了越来越积极的作用^[6]。这些都为进一步扩大并深化中阿民间经贸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

值得一提的是,自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阿文明交往在正规化、制度化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并在论坛框架下确立了“中阿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框架,极大地推进了双方政治、经贸、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多边合作,并建立了部长级会议、高官委员会、企业家大会、专题经贸研讨会、能源合作大会、文明对话研讨会、文化交流、高教与科研合作、新闻合作论坛、环境保护合作、人力资源培训以及民间交流等13个合作机制^[2]。其中,关涉人文交流的合作机制多达7个,为中阿双方开展行之有效的民间交往提供了制度保障,中阿民间交往呈现出“积极、有序、活跃、持久”的总体态势,主要表现为:(1)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内的中阿民间交往日趋理性与规范化,自2006年起每两年召开一次的中阿友好大会已举行了四届,并就经贸、文化、教育、地方政府等开展进一步交流与合作达成共识;(2)中阿合作论坛对推进中阿民间交往向纵深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中阿友好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等开展的对阿民间交往取得了长足进步,为落实论坛行动计划发挥了特殊作用;(3)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又为中阿民间交往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加深了中阿社会精英、青年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未来的中阿民间交往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也正是得益于日趋机制化的中阿民间交往,目前“双方政治互信进一步增强。中方坚定地支持阿拉伯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致力于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支持阿拉伯国家维护合法民族权利。阿拉伯国家也在涉及中国重大利益和关切问题上给予我们宝贵支持;双方经贸往来更加密切。中阿贸易额快速攀升,2011年达1959亿美元,同比增长34.7%。企业家大会暨投资研讨会、能源合作大会等机制为双方搭建了新

的务实合作平台。在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中阿经贸合作逆势而上,充分显示了双方务实合作的强大活力和广阔前景;双方人文交流日趋活跃。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中阿友好大会、中阿新闻合作论坛、中阿文化节等一系列人文活动精彩纷呈,在中阿人民之间特别是青年之间架起了一座座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桥梁。现在有近8000名阿拉伯留学生在华学习。每年还有1000多名来自阿拉伯各国的各类人才在华接受培训。”^[7]

三、“中阿友好大会”的回应之策

受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中阿文明交往中面临一些需要经过双方努力加以克服的障碍性因素。

1. 彼此的认知和理解尚待加强。由于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国际地位等方面的差异,中阿双方对彼此的认知和理解均存在一定的偏差:就阿方而言,突出表现在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期望过高,希望中国扮演平衡或对抗美国霸权的国际角色等。就中方而言,突出表现在对阿拉伯世界的社会文化、战略地位特别是发展现状等缺乏足够的了解等。此外,西方对国际舆论的强势主导地位,也对中阿双方的认知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2. 官方交往与民间交往不平衡。目前中阿文明交往的主体及其途径仍主要以官方为主,民间交往虽有一定发展,但相对中国与欧美和东南亚地区的民间交往,中阿文明交往的发展亟待进一步推动、引导与提高。事实上,在中阿文明交往史上,民间交流历史悠久、绵延不断,并对维护中阿友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只有民间交往的动力不断增强,渠道日趋多样,中阿文明交往才能更具活力与影响力。

因此,如何“在新形势下努力开拓双方合作的新领域,打造新亮点,不断提升论坛对中阿关系发展的示范和促进作用”则成为当务之急。

在中阿文明上千年交往史上所形成的民间交往模式,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色:(1)由商旅、教旅和学旅所构成的交往框架,涵盖了普通民众间的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以及社会精英间的核心价值观沟通,满足了不同群体主要的社会诉求,夯实了民意基础;(2)它具有从宗教、经济、教育→社会、从草根阶层→社会精英、从物质诉求→精神诉求等,全方位地服务于官方大外交、潜移默化的作用;(3)中阿民间持续开展的互惠共赢的商旅、包容异己的教旅以及尊重他者的学旅,为中国与伊斯兰国家形成“相互支持的政治伙伴、互利共赢的经济伙伴、交流互鉴的人文伙伴”^[8]奠定了社会基础;(4)和平性、互惠性与包容性,既是中阿文明交往的基本特征,也是中阿交往值得总结的历史经验,并由此成为中阿民间交往模式的基本特征。

质言之,“三轨并存”的交往模式,既是中阿民间交往史上历史经验的产物,也是中阿文明交往的基本途径与方式,更成为新中国对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人文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在“中阿友好大会”这一民间交流框架下日趋机制化,获得更大成效。

注释:

①本表根据国家宗教局、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等网站汇总制成。

参考文献:

- [1]江淳,郭应德.中阿关系史[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
- [2]杜佑.通典[M].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 [3]马丽蓉.中阿文明交往面临的挑战及对策思考[J].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2):11.
- [4]马晓霖.伊斯兰圣地朝觐面面观[A].时延春.丝路盛开友谊花[C].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 [5]杨志波.中国穆斯林朝觐使用手册[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120.
- [6]刘一杰.专家预测伊斯兰会议组织间贸易额将在2020年增长10%[EB/OL].中国经济网,2011-04-14.
- [7]杨洁篪.深化战略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写在中阿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即将召开之际[EB/OL].<http://www.fmpre.gov.cn/chn/gxh/tyb/zyxw/t935741.htm>
- [8]贾庆林会见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EB/OL].人民网,2012-06-29.

责任编辑:谭 锋